



海外见闻

在日本,扔掉一件垃圾有多难?

□ 霍耀林

7月1日起,上海正式实施垃圾的“强制分类”,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将面临200元的处罚,单位混装垃圾则最高可能被处5万元的罚款。而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与日本的处罚规定相比,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对垃圾分类处理进行规范,如《废弃物处理法》《关于包装容器分类回收与促进再商品化的法律》《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其中,《废弃物处理法》第二十五条十四款规定:个人如乱丢垃圾等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约63万人民币);如果是企业或团体则重罚3亿日元(约1895万人民币)。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伴随此垃圾的制造量也与日俱增。到70年代,日本也遭遇了“垃圾围城”,为了解决垃圾造成的环境、资源等问题,日本开始试行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

1973年2月28日,作为垃圾的处理对策,东京都议会美浓部知事宣布应该尽快在东京都23区实行垃圾分类。4月起,东京就试行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简单分类。之后又将塑料等进行



日本人从小就在家里或幼儿园学习各种垃圾的分类处理

了分类处理,到第二年,再将瓶、罐等从不可燃烧的垃圾中区分出来。

而当时的日本家庭主妇们,一方面对垃圾实行分类处理表示了支持,而另一方面由于垃圾分类不仅增加了主妇们的负担,而且当时两周回收一次垃圾,导致家庭垃圾保管时间太长,市民怨声载道。政府不得不在1974年4月起将两周一次的回收改为一周一次。

为了推动市民积极主动进行垃圾的分类投放,日本政府还在东京的所有电视台投放了垃圾分类的广告,强化所有市民对于垃

圾的分类。到1985年,日本干电池的使用量大增,而废弃干电池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触目惊心,政府不得不开始将干电池也单独分类进行回收处理。

1989年3月5日,日本政府首次针对“垃圾处理”进行的国民意识调查结果公布。调查结果显示,98%的日本人都能遵守垃圾分类处理的规定,但是近半数人反对在自己家附近建设公共垃圾处理场。可见,此时日本人对于垃圾分类处理虽然表示支持,但却明显偏向利己的现实。

1990年4月,为保护森林,促进城市的废纸回收再利用,日本

政府率先垂范决定将过去作为一般垃圾投放的废纸进行分类收集制成的再生纸,作为政府的打印、复印用纸张。在此之前,日本政府虽然未进行过年用纸量的统计,但是单通产省纸业印刷课负责的中央省厅的打印、复印纸张用量就达到每年3万多吨。而利用再生纸的话,每年的垃圾将会减少甚至可达一半左右。

1995年,日本各家庭的废弃垃圾达到3500万吨,不仅无地可以填埋处理,而且环境问题也日趋严峻。减少垃圾的排放、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利用刻不容缓。当时家庭垃圾的近60%为食品及日用品等的容器或包装。为此日本制定了容器包装回收法等,实行容器包装等的回收制度,致力于减少各种包装垃圾,推进循环可回收型的容器包装。该法于2000年起完全施行。

2006年,随着市民的回收意识的提升,日本还进一步修订了该法,在容器的轻量化、材料选择易回收等方面的进行了各种努力,致力于家庭垃圾的减少和回收。

日本的家庭垃圾的分类、处理方法都是由各都道府县或各市町村等自治体制定十分细致的垃圾分类法。但大体可以区分为:

可燃垃圾:餐厨垃圾……

不可燃垃圾:金属、玻璃、陶瓷、干电池……

资源垃圾:食品用的瓶、罐、塑料、废旧纸张……

粗大垃圾:大型家电、家具……

去日本某地生活的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日本其他地方迁移来的,都必须要去该地的区役所登记。而在登记的同时,就会领到一本当地的垃圾处理手册,有几十页,也有更厚的,上面会列有各种垃圾的分类和处理方法。办理好入住手续后,日本人一般都会给附近邻居进行简单的搬迁后的问候,邻居就会告诉当地小区的一些注意事项,有时,所在小区的管理员也会亲自上门告知一些相关的事项,附近的避难所、儿童游乐设施,以及最重要的该小区的垃圾投放的具体的规定。

一般来说,可燃垃圾和资源垃圾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来收集,只需要按照收集规定在指定时间的当天上午8点前投放到指定垃圾投放地点即可。而废旧纸张、玻璃、小型金属、干电池等在日常生活中量并不大,所以每个小区都有固定的集中投放地点,按时投放即可。

不可否认的是,垃圾分类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又减少了污染,还美化了环境,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城市所应追求的时尚之一。

(选自《华人周刊》)



中国摄影师拍摄非洲面孔

□ 杨逸男

2019年春季,李东完成了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回到广州。

自从十年前弃商玩摄影以来,化工专业出身的他开始崭露头角,展出摄影作品《宝汉人家》等,备受外界关注。

因为在中国见到很多非洲人群体,李东很想知道他们原来的生存状况,于是,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穿越西非和东非五国。经过非洲五国的走访,他发现中国为非洲当地基建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中国产品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拓展海外市场。

这次非洲之行,李东的随身衣物和证件、药品只备了一个小行李箱,另外两箱全是特意准备的摄影、录音、摄像设备。他办理了《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带上许多防蚊喷剂和药膏,并将行程安排五个非洲国家的首都,选择条件较好的民宿居住。两个月下来,他并没有碰到疟疾或其他疾病,还笑着说有些防蚊过度了,“蚊子”都是飞直线,很好消灭”。只是初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李东没戴帽子走了一天,结果头顶晒得肿红,“吓坏了,手指头按下去是半厘米深的坑。皮肤绷得光亮油黄的,像北京烤鸭,两天后才消”。

理工男的跨界之行

此前,李东是一名经商的好手。在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李东于1992年来到广州石化设计院工作;2003年后,他做起了高端家具供应商并担任总经理;2008年,李东忽然放弃主业,开始人文和纪实摄影的尝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14年,展出广州题材的作品后,他开始参加各种讲座,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并不断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对广州的认识一直在积淀和酝酿,就像葡萄的发酵过程”。选择去非洲,是因为李东在摄影过程中遇到很多来到中国的非洲人,这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了解那些留在老家非洲人的生活。

可当他真正来到非洲后,很快就碰到很多不适应。首先是水电供应不足,即使在内罗毕,他也很难享受到冲凉的感觉;而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他也经常遭遇停电停水;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的基础建设并不太好。“公共设施和社会设施比较弱,条件好的家庭自备发电机、高水塔。很多人对中国的的生活非常向往。”李东说。

但这些困难丝毫不减他想深入了解非洲的愿望。每到一地方,他常常要来回逛上十公里。刚开始,他不敢入夜后在外溜达,但

后来发现,“很多当地人都很客气和热情”。

观察完城市后,他就扛着设备找人拍摄,靠着翻译器和不熟练的英语,穿梭于当地酒吧、公益机构、学校和华人企业等。

和当地人沟通,李东颇有心得。在内罗毕,他特意购买了当地的民族服装,而在炎热的拉各斯,他也入乡随俗地剃了光头,“只要展现出尊重和友善的姿态,当地人都比较愿意交流”。就这样,他融入到形形色色的朋友圈中,不仅有贫民窟艺术家、中产阶层的绅士或女士,还有中国的企业家和华侨慈善机构等。他还有幸赶上了拉各斯的华人春晚,欣赏孔子学院非洲学生表演的武打、唱歌等节目,也习惯了“时刻要和苍蝇去抢的”牛肉汤,吃着蘸酱油和辣椒的牛油果。

两个月下来,他累得够呛,尽管很多地标区域他都没时间去,但丰富的采访资料给他全新的体验和思考。

中国援助改善当地人生活

游历非洲五国,李东感叹中国的援助大大改善了当地非洲人的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他看到干净的贫民窟和拥有垃圾桶的人行



亚的斯亚贝巴的老城区 Piazza

道,中国承建的轻轨每日人来人往,在当地备受欢迎。而中国投资的东方工业园区则解决了大量当地劳工的生存问题。那些自备水箱和发电机的小区在他看来,“就像十年前广州的经济开发区,每家工厂自备消防水池和柴油发电机一样”。

在气候条件最好的内罗毕,李东则感受到了开放、法治的国际化都市身影,“每个人都在行色匆匆地奔忙,想方设法地改善生活,连贫民窟也在自行解决问题。”他看到内罗毕老街市中心的车站旁,在正午直射的阳光下,一个黑人小哥像人工复读机般口头播报着广告。李东认为,这正是非洲崛起的动力。

华人企业在非洲发展同样生机勃勃,“中国文化对非洲来说是时尚、先进的”。

对李东来说,创作只是水

到渠成的事。采访20多人后,他带回了2T的影像资料,“我真正从个人角度认识了非洲。”

李东对非洲一直非常关注,并为非洲之行做了很久的准备。他把自己“闭关”的地方称为“山洞”,这其实是位于清静的一座独栋别墅。只是家里空荡荡的,偌大的客厅中,简单放着几样家具,铺上非洲主题的桌布,用花瓶插上两支花。

唯一像样的地方是李东的书桌和工作室。三年来,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一个人待在这座别墅中,阅读关于非洲的书籍、学习写小说和剧本创作,做笔记、学制片。他常常搬一个小桌放在阳台上,边看书边做笔记,写写画画,直到越写越顺畅。隔一段时间,他又换到大客厅的书桌办公,寻找新思路。

(节选自《广州日报》)